

藏 地

文 明 探 寻

石 硕 著

西藏学出版社

藏地 文明探寻

石硕 著

中国藏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藏地文明探寻/石硕著.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2018. 11

ISBN 978-7-5211-0080-8

I. ①藏… II. ①石… III. ①藏学-文集 IV. ①K281.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86083 号

藏地文明探寻

石硕 著

出版发行	中国藏学出版社
印 刷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2.75
字 数	294 千
印 次	2019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211-0080-8/K · 547
定 价	56.00 元

图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

E-mail: dfhw64892902@126.com 电话: 010-64892902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从人类起源的新观点看西藏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	(1)
一个隐含藏族起源真相的文本	
——对藏族始祖传说中“猕猴”与“罗刹女”	
含义的释读·····	(14)
聂赤赞普“天神之子入主人间”说考 ·····	(35)
从有关止贡赞普父子的记载看藏文史料的两个传承系统	
·····	(55)
佛教对吐蕃王朝政权体制的影响	
——兼论吐蕃王朝前、后期政权形态的变化 ·····	(70)
关于金城公主入藏及出嫁对象等相关史实的考订·····	(87)
金城公主事迹中一个疑案的研究	
——关于金城公主在吐蕃是否生子问题的考证·····	(99)
高原丝路:吐蕃“重汉缯”之俗与丝绸使用 ·····	(111)
从藏文史籍中的四个称谓看吐蕃对唐太宗的认知	
——兼论吐蕃的中原观 ·····	(135)
达磨灭佛对佛教在藏区传播趋势的影响 ·····	(155)
西藏文明的东向发展	
——13 世纪西藏与中原政治关系形成的必然性 ·····	(172)

蒙古在连接西藏与中原政治关系中的作用	(187)
藏族三大传统地理区域形成过程探讨	(205)
藏彝走廊:一个独具价值的民族区域	
——论费孝通先生提出的“藏彝走廊”概念	(224)
藏彝走廊历史上的民族流动	(241)
附国与吐蕃	(264)
《旧唐书·东女国传》所记川西高原女国的史料纂乱及 相关问题	(286)
川西北嘉绒藏人与象雄琼氏渊源关系探讨	(300)
隐藏的神性:藏彝走廊中的碉楼	
——从民族志材料看碉楼起源的原初意义与功能 ...	(324)
青藏高原碉楼的起源与苯教文化	(343)

从人类起源的新观点 看西藏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

关于青藏高原古人类来源问题，过去曾流行过一个颇令人鼓舞的观点：青藏高原特别是作为其腹地的西藏极可能是人类的重要起源地之一。此观点曾对从事青藏高原史前及藏族历史研究的学者产生过相当影响，不仅影响到人们对西藏旧石器时代文化遗迹的认识，甚至一些学者还将青藏高原人类乃至藏族始祖人群直接或间接地追溯于青藏高原东部边缘的元谋猿人。但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人类起源研究领域取得重大突破，过去有关人类起源所建立的传统认识体系受到严重冲击与挑战。对这一挑战视而不见或避而不谈显然已非明智之举。此外，由于人类起源研究的突破主要缘于分子生物学领域，其研究结论尚未为人文及藏学领域的学者所普遍知晓。在此背景下，笔者认为从人类起源新观点之视角来重新认识和讨论西藏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不仅十分必要，而且可以丰富和扩展我们对西藏地区旧石器时代文化内涵的认识，同时亦可纠正过去我们认识上的若干偏差与失误。

人们对西藏这一高海拔地区人类来源问题的认识曾几经曲折。最初的看法是，远古时代的西藏乃是一片荒凉不毛之地，因

海拔极高而不太适宜人类居住与生存，因此认为西藏最早的人类不仅是从周边地区迁徙而去，且迁入时间甚晚，国外乃有少数人类学家认为直到新石器时代晚期西藏高原才开始有人类居住^①。但1949年以来，随着西藏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不断被发现，这一认识在从事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学研究的学者那里发生了很大逆转，几乎被调了个个儿——青藏高原地区开始被作为人类可能的起源地之一受到关注。过去以对古生物和古人类化石为研究对象的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学所建立起来的人类起源与演化模式，曾积极致力于探寻200万年以来东非猿人、北京人、爪哇人、元谋猿人与当今世界各地人类的关系。特别是青藏高原东南边缘的云南元谋县发现距今170万年元谋猿人化石以后^②，古人类学家贾兰坡先生也认为：“正当从猿变到人期间，青藏地区仍然是适合人类演化的舞台，到那里寻找从猿到人的缺环也是有希望的。”^③考古学家童恩正先生也指出：“从第三纪后期开始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促成了西藏高原的隆起，引起了南亚地形、气候及生态环境的急骤改变，给生活在这一地区的古猿向人科的进化带来了重大影响。”^④此说更鼓舞了人们在青藏高原地区寻找人类起源踪迹的信心。在此基础上，一些学者提出过一个大胆构想：青藏高原极有可能是人类的重要起源地之一。德国人类学家阿玛顿·格列本指出：“第三纪晚期喜马拉雅山隆起，蒙藏地区森林消灭，迫使人类的远祖——古猿从森林转入地面生活，逐渐

① Cordon T. Bowlws, “the people of Asia”, Charles Seribner, New York, 1977, p. 59.

② 胡承志：《云南元谋发现的猿人牙齿化石》，《地质学报》1973年第1期；李普等：《用古地磁方法对元谋人化石年代的初步研究》，《中国科学》1976年第6期。

③ 贾兰坡：《我国西南地区在考古学和人类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载《云南社会科学》1984年第3期。

④ 童恩正：《中国西南的旧石器时代文化》，载《童恩正文集·学术系列·南方文明》，重庆出版社，1998年，第31页。

变为现代的人类。”^① 童恩正先生进一步提出：“中国的西部，特别是西藏高原及其邻近地区，有可能是从猿到人进化的摇篮。”^② 上述观点曾对从事青藏高原史前及藏族历史研究的学者产生过重要影响^③。但此观点是建立在这样一个传统认识基础之上：过去东亚大陆所发现的一百多万年至几十万年的直立人（*Homo erectus*）如元谋人、蓝田人、爪哇人、北京人等，他们进化以后成为今天的现代蒙古人种，他们是亚洲现代蒙古人种的直系始祖。

但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东非大峡谷一系列有前后年代关系的人类起源实物证据的发现，特别是美国遗传学家瑞贝卡·卡恩（Rebecca L. Cann）和艾伦·威尔逊将分子生物学技术运用于人类遗传多态性研究所得出的全新结论，使有关人类起源问题的认识取得了重大突破。1987 年卡恩和威尔逊等人发表关于人类线粒体多样性的研究成果，首次从人类 mtDNA 多态性数据推断出人类的共同祖先、人类起源的时间，其简明的结论是：“可以设定所有这些线粒体 DNA，共同起源于一个 20 万年前生活在非洲的女人。”^④ 这就意味着，我们过去所找到的无论是元谋猿人、蓝田猿人、爪哇人或北京人都不是今天地球人类的始祖，他们的后裔没有能够延续下来，换言之，他们均是人类进化

① 葛维汉：《华西协合大学古物博物馆的石器》，载四川省文管会：《四川石器时代译文资料》，1983 年编印。

② 童恩正：《西藏考古综述》，载《文物》1985 年第 9 期。

③ 格勒：《论藏族文化的起源、形成与周边民族的关系》，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 年，第 44 页。

④ [美] 斯宾塞·韦尔斯著，杜红译：《人类史前》，东方出版社，2006 年，第 50 页。

史上遗传演化与生存竞争中的失败者^①。当今地球人类的真正祖先是晚期智人。晚期智人（Late Homo sapiens）的直接祖先则是距今约9万至22万年前（现常用15万年前作代表）同一位女祖宗的后代。他们当时是从早期智人（early Homo sapiens）进化而来的一个东非的小群体，这个种群据估计当初的人口总数可能只在1万人以内，那时他们身上的mtDNA应还完全相同。^②

2000年，有关人类起源的分子生物学研究再次取得重大突破。以彼德·昂德希尔和彼德·欧芬纳为首的20余位科学家在《自然遗传学》杂志发表共同研究成果，这项大型研究成果根据对男性Y-染色体多态性研究，其结论不仅仍清晰地显示当今分布于世界各大陆的现代人均起源于非洲，而且对于人类起源及其迁徙时间得出另一个更为重要的结论：在6万年前，现代人全部生活在非洲。也就是说，现代人类祖先是从5万年前才开始由非洲向外迁徙，并逐渐散布于世界各个角落的。Y-染色体研究的重要价值还在于，科学家们根据世界各地Y-染色体谱系的分布图，大体勾勒出了现代人类从非洲向世界各大陆迁徙的路线与时间。根据其研究，现代人进入东亚的时间大约在距今3万5千年至3万年前后^③。

以上是分子生物学有关人类起源研究所取得的最新进展。这

① 目前仍有少数科学家坚持“地区连续性”进化模式，否认东亚智人起源于非洲。对此，遗传学家斯宾塞·韦尔斯作了如下阐述：“从基因中找不到任何支持这一理论的证据，而且基因研究的结果表明，移民到东亚的现代人和直立人之间，没有出现过交融的现象……近年，中国遗传学家金力和他的同事进行了一项研究，在东亚各个地区对1万2千名男性进行了取样，结果表明他们每一个人都能回溯到5万年前的非洲祖先，因为每个人的Y-染色体中都有M168标记。对寻找东亚地区连续性进化模式的科学家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坏消息，因为这一结果，至少对男性谱系，完全否定地区进化的理论。而东亚的线粒体DNA做出了同样的回答：几千份取样，结果全部显示他们的祖先在非洲。总之，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直立人在现代东亚人的基因中留下了痕迹，而且大量的证据表明，杜波斯的‘人猿’走进了进化的死胡同，他们完全被现代人替代了。”参见[美]斯宾塞·韦尔斯：《人类史前》，第150页。

② 瑞贝卡·卡恩（Rebecca L. Cann）的论文发表于Nature，1987，325，31。

③ [美]斯宾塞·韦尔斯：《人类史前》，第151页。

一最新科学结论，对我们认识和理解西藏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带来哪些启示与意义？这一点显然值得我们思考。笔者认为，至少带来两个方面的重要启示与借鉴。

一、关于西藏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年代

有关西藏旧石器文化遗存的年代，一直是一个较为模糊的问题。迄今为止，青藏高原发现的被初步确定为旧石器时代的石器地点共有8处，它们是：定日县的苏热，申扎县的多格则、珠洛勒两个地点，日土县的扎布，普兰县的霍尔区，吉隆县的东淌和却得淌两个地点，阿里夏达措地点等。但以上所有这些旧石器地点，其旧石器标本均为地面采集，缺乏原生地层证据，所以，对其年代的判定主要是根据这些石器本身的型制、制造技术以及同周边地区发现的旧石器进行比较之后作出的初步估计，其中所包含的感性与经验成分乃不言而喻。目前，考古学界对西藏旧石器文化的年代范围主要判定在距今1至5万年左右。而最早将西藏旧石器年代上限确定为距今5万年，乃是缘于对西藏定日县苏热地点采集到的旧石器的认识。1964年，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在西藏定日县苏热地点采集到打制石器40件，石器的种类主要有石片、边刮器和尖状器三种，其中一件尖状器略呈心形。石片均用锤击法打出，石器则多由劈裂面向背面加工，并主要有单向和错向两种加工方法。采集者依据其加工方法较为成熟、器形稳定及出现了心形尖状器等迹象，初步判定其年代应在旧石器时代中、晚期，即大约距今5万年左右^①。这一年代判断显然只是基于考古类型学的一个推测，并无确切的地层学和年代测定数据的依据。但此后，以距今5万年为西藏旧石器上限的

^① 张森水：《西藏定日新发现的旧石器》，载《珠穆朗玛峰地区科学考察报告·第四纪地质》，科学出版社，1976年，第105—109页。

认识遂为青藏高原史前研究及藏族历史研究的学者所沿用和采纳，笔者在讨论西藏旧石器文化的论文中也曾采纳这一上限年代^①。现在来看，对西藏旧石器上限年代的推断显然估计过高。根据生物遗传科学有关人类起源的最新研究成果，由非洲大陆向外迁徙的现代人由北方路线进入东亚的时间大约在距今3万5千年至3万年前后。那么，青藏高原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上限年代最多只能上溯到距今3万5千年至3万年前。

倘若我们将视野扩大于青藏高原范围，生物遗传科学依据Y-染色体谱系分布图所得出的现代人进入东亚时间的结论，相当程度上也得到青藏高原地区旧石器时代遗存之年代的佐证。目前青藏高原地区发现的有明确地层关系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共有两处。其一，1982年在青海省柴达木盆地的小柴旦湖滨阶层的砾石层中发现了一批人工打制的石制品^②，这是一处有明确地层关系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因此能够对它的年代作出较为准确的判断。根据碳14测定和地层对比，这批石制品的年代距今大约3万年。“它的出现表明在更新世气候条件较为有利的时期，今日不宜人类生存的青藏高原同样有人类活动。”^③其二，1983年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古脊椎动物组在青藏高原东部雅砻江上游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炉霍县虾拉沱附近的鲜水河东岸的宜木和亚巴两个地点分别发现含有古人类牙齿、旧石器材料及哺乳动物化石的地层层位，根据碳14年代测定以及伴生的哺乳动物种群，这批古人类牙齿化石和人工石制品的年代距今11500+200年，即距今年1万1千年左右^④。目前青藏高原地区这两处

① 石硕：《青藏高原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内涵及相关问题》，《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1期。

② 黄慰文：《柴达木盆地发现旧石器》，《人类学报》1985年第4卷1期。

③ 贾兰坡、黄慰文：《三十六年来的中国旧石器考古》，《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10页。

④ 宗冠福、陈万勇、黄学诗：《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炉霍县发现的古人类与旧石器材料》，《史前研究》1987年第3期。

有明确地层层位的旧石器人类活动遗存其年代范围均在距今3万年以内，这与生物遗传科学依据Y-染色体谱系分布图所得出现代人进入东亚的时间是在3万5千年前后乃大体相吻合。因此，根据有关人类起源的最新研究成果以及青藏高原地区有明确地层层位的旧石器遗存的碳14年代测定数据，将已发现的西藏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上限年代确定在距今3万5千年至3万年以前显然更为合理，也更具科学依据。这是人类起源新观点对我们认识西藏旧石器时代文化遗迹所带来的第一个启示。

二、西藏高原的旧石器时代人群来自何方？是由南方海路而来的“海上部落”，还是由北方欧亚大草原向东徙的“欧亚部落”？

人类起源研究取得的新成果，给我们认识西藏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带来的另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是：旧石器时代进入西藏高原的人群是北方人群还是南方人群？此问题对我们理解西藏新、旧石器时代乃至延续至历史时期的文化特点与性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按照Y-染色体分布图所得出的结果，5万年前现代人由非洲迁入东亚主要走了南、北两条线路，对此，美国遗传学家斯宾塞·韦尔斯作了如下的描述：

从基因图谱中浮现出了这样的画面，像一双“钳子”或“筷子”，现代人从南、北两个方向来到东亚定居。欧亚部落走的是北方路线，他们很可能在3万5千年前由南西北利亚的大草原进入东亚，而走南方路线的海上移民部落，他们迁徙的时间比亚部落要早，约在5万年前。今天东亚存在的谱系证明了古老的南—北区别。路卡·卡瓦利-斯福特曾和中国同行合作，对东

亚人数十个非 Y-染色体多态性进行了检测，他们发现中国的北方人和南方人之间有明显的区别。甚至在同一个民族之中，比如北方的汉族人和南方的汉族人，事实上他们彼此之间的密切关系，更多的是地理上的，而不是民族上的。因为他们是两个不同部落的后代，几万年前两个部落从不同方向进入中国。今天，南北谱系的差异依然清晰可见。^①

那么，按照现代人分南、北两路进入东亚之情形，西藏高原旧石器人群是从什么方向迁入的？他们是属于北方人群还是南方人群？对此，我们显然需要从西藏旧石器时代文化内涵同周邻地区旧石器文化的关系之角度进行新的思考。

据考古学者的初步研究，西藏高原旧石器文化所呈现的一个明显特征是与华北旧石器文化之间存在若干共性，这主要表现在其石器类型和制造工艺等方面已经显现出与华北旧石器时代常见的一些特征，例如在石器类型上，石片石器占有较大数量，石片石器均用锤击法打片，多由破裂面向背面加工，并保留砾石面，石器工具有组合则以砍器、边刮器和尖状器三种器形最为普遍，这些都是华北旧石器时代常见的特征。另外，在藏北申扎、双湖一带发现的旧石器中出现了一种椭圆形的长刮器和长条形圆头刮器、尖状器等，这些器形都同样见于河北阳原虎头梁、山西沁水下川以及宁夏水洞沟等旧石器时代遗址。所以，考古学者认为西藏旧石器文化的特征与华北旧石器传统相一致。^②

西藏高原旧石器为什么会呈现与华北旧石器相似的特征与文化传统？这种局面是如何造成的？事实上对这一点，人类基因 Y-染色体图谱已经为我们提供了答案。关于从北方沿欧亚大草原迁徙的“欧亚部落”进入东亚的情形，遗传学家斯宾塞·韦

① [美] 斯宾塞·韦尔斯：《人类史前》，第 151 页。

② 安志敏、尹泽生、李炳元：《藏北申扎、双湖的旧石器和细石器》，《考古》1979 年第 6 期。

尔斯作了如下描述：

随着一些欧亚人沿兴都库什山进入印度，欧亚部落的另一些人沿着天山的方向，向东、向北迁徙，其中有些人很可能通过“准噶尔裂谷”（成吉思汗正是由此侵入中亚的），进入了现在的中国。大部分移民很有可能沿着大草原公路一直向北，为了避开环境恶劣的中国西部大沙漠，他们绕道经过南西北利亚。我们现在有幸知道这一切，是因为这些移民给他们的后代留下了 M175，这个标记只能在东亚找到，在西亚和欧洲完全没有。

今天，出现在欧亚 M9 谱系的 M175 标记，在韩国和比率高达 30%。使用绝对时间检测法，它出现在大约 3 万 5 千年前，与朝鲜、日本旧石器时代后期开始的时间相一致。……今天生活在兴都库什山和喜马拉雅山以东的大部分亚洲男人，他们的“配方”里都有 M175 标记，是它形成了东亚部落。^①

也就是说，从北方沿欧亚大草原迁徙的欧亚部落实际上分成了三支：一支沿兴都库什山脉进入印度；一支向东可能是通过“准噶尔裂谷”（今中国新疆）进入了中国，但人数较少；其中“大部分移民”即最主要一支即则是沿着大草原公路一直向北，绕道经过南西北利亚而进入东亚并成为携带 M175 标记的东亚人群主体。这一支东亚主体人群可能是构成华北地区旧石器人群的主要来源。华北地区旧石器人群向周边地区尤其向黄河上游青藏高原地区的迁徙与扩散，极可能是造成青藏高原旧石器面貌呈现与华北旧石器相似的特征与文化传统的重要原因。

关于西藏旧石器与华北旧石器之间存在联系这一点，尚可由另一事实得到佐证。目前在青藏高原东南部地区发现五处旧石器时代人类活动遗址和地点。它们是：汉源富林遗址、汉源狮子山

① [美] 斯宾塞·韦尔斯：《人类史前》，第 149 页。

地点、攀枝花迥龙湾洞穴遗址、甘孜州炉霍县人牙化石和石制品地点、北川县人牙化石地点。这五处遗迹均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分布于青藏高原东部和东南部的旧石器晚期遗存在文化面貌上均主要表现为小石器或细石器类型。而考古学者普遍认为这些小石器类型明显是承袭华北旧石器的小石器传统^①,故学者们据此推断,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即大约1—2万年前,具有小石器和细石器传统的北方人群已经开始由黄河上游的甘青高原向南迁徙,进入青藏高原东南部横断山脉地区(川西高原),他们将源自华北的小石器或细石器传统带入了这一地区。他们主要活动于青藏高原东部的河流阶地、河谷盆地及洞穴地带,以狩猎—采集为主要生计方式。^②既然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使用华北小石器传统的北方人群已由黄河上游甘青高原南迁进入青藏高原东南部横断山脉地区,那么,华北地区旧石器人群沿黄河上游甘青地区向西进入西藏高原的可能性就难以避免,以此背景而论,西藏高原旧石器文化呈现出与华北旧石器的相似的传统就应是顺理成章之事。

毫无疑问,西藏高原旧石器面貌呈现出与华北旧石器相似的特征与文化传统,可能揭示了一个事实:西藏高原旧石器时代的主体人群不仅属于从北方沿欧亚大草原向东徙的“欧亚部落”,而且是欧亚部落中主流的一支即属于携带 M175 标记的东亚主体人群,他们进入西藏的路线乃是南下东北亚及华北大平原,再由华北平原向西迁移沿黄河上游进入到西藏高原。正因为如此,才直接导致了西藏旧石器的面貌呈现出与华北旧石器相似特征及文化传统。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西藏高原的旧石器文化面貌并不完全单

① 张森水:《富林文化》,载《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7年第1期。

② 石硕:《从旧石器晚期文化遗存看黄河流域人群向川西高原的迁徙》,《西藏研究》2004年第2期;叶茂林:《四川旧石器时代考古》,四川大学考古专业编:《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创建三十五周年纪念文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8页。

一，也呈现出某些多样性与区域性特点，尤其在西藏西部及西南部某些局部区域较为明显。例如，在西藏吉隆县哈东淌和却得淌两个地点发现的旧石器标本，其总的特点是以砾石石器为主，少见石片石器，器形组合也以刮削器和砍器为主，不见尖状器，石器原料绝大部分为黑色板岩，均由扁平砾石加工而成。故调查者认为，吉隆县旧石器标本呈现的上述面貌，“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远古时代吉隆盆地的生态环境，也有别于西藏高原的其他各处旧石器地点”^①。并认为，吉隆县哈东淌和却得淌两个地点发现的旧石器标本与内地南方盛行的以砾石作为原料制造石器的旧石器传统之间存在联系，理由是：“在打片技术上以直接锤击法为主，工具以重型砍砸器为主，加工方法上不见棒击法的压制技术等方面，都显示出与内地西南地区旧石器文化的相似性。从空间关系上讲，西藏的东北部紧邻四川盆地，东南部与云贵高原相毗连，因而从最遥远的古代开始在文化的发展上便已有着时空上的联系性，也不是不可能的。”^② 西藏高原的旧石器文化面貌所呈现的某些多样性和区域性特点是否意味着西藏高原的旧石器人类也有从其他方向如内地南方进入的可能性？这一点目前虽难以确认，但其可能性显然存在。

过去曾有学者将西藏高原的旧石器同西面的印度、巴基斯坦等地发现的旧石器进行过比较，其结论认为：“巴基斯坦的梭安（soan）文化和印度的聂瓦斯（nevasian）文化都和西藏的发现（指旧石器）有着显著的不同。说明它们分别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而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③ 说明在旧石器时代，横亘于西藏高原与印度、巴基斯坦之间的喜马拉雅山脉对人类活动的制约

① 索朗旺堆主编：《吉隆县文物志》，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7页。

② 索朗旺堆：《西藏考古新发现》，四川大学博物馆、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南方民族考古》，1991年第4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第10页。

③ 安志敏、尹泽生、李炳元：《藏北申扎、双湖的旧石器和细石器》，《考古》1979年第6期。

作用相当明显。不过从最近某些考古发现材料看，这也不是绝对的。例如，1992年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小组在西藏阿里最西边的夏达错发现一批属于旧石器时代的石器标本，其种类包括石核、石片和带有明显人工打制痕迹的石制品，其中即有一种十分独特和引人注目的手斧。这种手斧的特点是由厚石片、砾石或石块制成，器形平面呈叶形或矛头形，两面均经过修理，一般认为这类手斧用途与加工动物皮肉有关。这种手斧的发现在旧石器考古领域有特殊意义。20世纪40年代，法国学者莫维士（Hallam L. Movius）曾将全世界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分成两种传统，即“手斧传统”和“砍砸器传统”，前者主要分布于非洲、欧洲西部、中部和南部，中东和印度北部；后者则分布于东南亚、印度北部和中国^①。虽然莫维士的分类因论证过于武断和粗疏曾受到批评，但这一分类体系大体是成立的。故调查者认为，夏达错旧石器中的手斧，相邻近的克什米尔、帕米尔高原的石器时代文化有着一定的关联。“过去在南亚西北部的‘索安文化’中是一种比较流行的器物，形制上与夏达错地点发现的手斧也接近，两者之间很可能存在着密切的联系。”^②童恩正对青藏高原手斧的研究，其结论也是：“青藏高原的手斧，很可能即是受了印度北部手斧文化的影响而产生的。”^③由此可以认为，旧石器时代尽管作为地理屏障的喜马拉雅山脉在总体上构成了东亚与南亚印巴次大陆之间的文化分界线，但却并未阻断和隔绝两地间的交流，青藏高原尤其是西藏西部与印巴次大陆之间的文化联系仍然较为密切，两地旧石器人类之间应存在相当程度的联系与交往。不过，从旧石器时代的手斧主要分布于非洲、欧洲西部、中部和南部，

① Movius, H. L. 1944; "Early Man and Pleistocene Stratigraphy in southern and Eastern Asia", *Papers Museum of American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 Harvard University, vol. 19, no. 3. 1949; "Lower Paleolithic Archaeology in Southern Asia and the Far East", *Studies in Physical Anthropology*, no. 1, Early Man in the Far East, 17-82.

② 霍巍：《阿里夏达错湖滨旧石器的发现》，《中国西藏》1994年第6期。

③ 童恩正：《青藏高原的手斧》，载《考古》1989年第9期。